

歷次革命战争几个主要战例的研究

(移交品)

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步兵学校训练部翻印

1962年4月

目 录

-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反“围剿”战例的研究
 - 第一、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造
 - 第二、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 第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 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三个主要战役的研究
 - 第一、辽沈战役
 - 第二、淮海战役
 - 第三、渡江战役
- 三、抗日战争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几个战斗类型的战例研究
 - 第一、平型关战役（伏击战之例）
 - 第二、宜川战役（围城打援之例）
 - 第三、鲁西南战役（运动战结合阵地战之例）
 - 第四、济南战役（攻坚战之例）
 - 第五、塔山阻击战
- 四、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防御战例的研究
 - 第一、上甘岭防御战役
 - 第二、第四次战役

F233/28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反「圍剿」战例的研究

第一 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图一)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在八月一日，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在江西南昌率领在党领导或影响之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但是这支起义部队没有与江西农民运动结合，而南下向广东进发，在长途进军和与敌人作战中，损失大部，所保留下的一小部份，于1928年4月由朱德等同志率领转战到井冈山，和毛主席所领导的红军会师。

南昌起义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起来，给予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有力的反击，高举了革命斗争的旗帜，继续进行革命事业。起义虽然是失败了，但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极重要的教育。“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因此，革命军队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土地革命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创造革命根据地，而后才能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占领的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以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是否可能呢？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情况后说：“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在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一带地区，领导农民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武装，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于同年10月间，毛泽东同志率领这支军队以井冈山为中心进行游击战争，创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政府”。

毛泽东同志领导革命力量向井冈山的进军，这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革命给了极勇敢的攻击。这个攻击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正是在人民最艰难的时候，这个革命根据地作了榜样。此后，党在中国中部、南部以及其他地方，还组织了许多次起义。如1927年由张太雷、叶剑英、叶挺、苏兆征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和由彭湃等同志领导的海陆丰起义，1928年由朱德、陈毅、王尔琢、林彪等同志领导的湘南起义。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由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渭华起义，由张云逸、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等。在这许多的地区，都坚持了游击战争，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由朱德等同志所率领的在南昌起义的一支部队，由广东经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领导当地农民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大了部队，并在1928年4月，转战到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部队相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基本力量，连同其他在各

大起义中所建立起来的红军，就是以后八路军、新四军，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日子，就是我军诞生的节日。

在创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当中，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大事。这个历史性的会师，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这支部队在毛主席领导下，就逐渐形成了一支新型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军队。

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所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进发，并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与其他各部份前来会合的红军逐渐扩编为红军第1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下属第1军团和第3军团，共约3万余人。朱德同志任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

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约6万人，江西中央区的红军已有3万数千人。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安徽、河南、广西、浙江、陕西、甘肃等省和广东的海南岛，在以上各地建立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

第二 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革命力量趁着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而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的不安和震动，他们为了集中力量向着红军进攻，便暂时结束了反动派内部的军阀混战。蒋介石进攻的矛头，首先是集中力量“围剿”中央区的红军。1930年底至1932年的两年中，蒋介石曾调集大批兵力向中央红军进行了四次“围剿”。英勇的红军，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连续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图二）

在蔣同馮、閻戰爭結束之後，1930年底，蔣介石派了七個師共約10萬人，開始對中央區紅軍進行第一次“圍剿”。

（一）敵我作戰方針：

敵軍對紅軍採取了以數路分進合力的作戰方法。

毛主席根據敵我情況的分析，提出了“撤開兩手，誘敵深入”的作戰方法。集中所有分散的紅軍主力，從邊沿區（吉安、崇仁、宜黃、南豐之綫）向根據地的中心轉移集結，引誘敵人深入到根據地內，群眾、地形等條件均有利於我之地區與敵作戰。在根據地則進行“堅壁清野、堅壁清城”肅清反革命，團結自己，鞏固根據地的工作，給敵以困難；在土地改革方面，進行“抽肥補瘦、抽多補少”的工作。從而打下了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基礎。

（二）敵我情況：

敵人從吉安、建寧之綫，由北向南，分為8個縱隊，向中央紅軍進攻。當時的紅軍約四萬人，集中於江西南都、黃陂、小布地區，至12月底敵我情況如下：

1、敵人的情況：

——敵軍共約10萬人，均非蔣介石的嫡系部隊。

——敵軍羅霖師防衛吉安，隔在贛江西岸。

——敌軍公秉藩、張輝瓚、譚道源3个师进占富田、东固、龙崗、源头一带。张师（18师）主力在龙崗，譚师（第50师）主力在源头。

——敌軍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

——敌軍毛炳文、許克祥两师进至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 B团（A B团由当时国民党潛伏在紅色区域内的反革命特务組織）易走漏消息。如打毛、許两师再向西打，恐张、譚、公三个师集中，不易取胜。

——张、譚两师是圍攻的主力軍，是圍攻軍总司令江西省魯滌平的嫡系部队。张为前敌总指揮。若消灭此两师，“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約14000人，张师又分置两处，紅軍一次打一个师是絕對优势。

2、紅軍的情况：

——龙崗、源头（张譚两师的所在地）接近紅軍的集中地，人民条件好，并能隱蔽接近。而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 B团欺騙一时不信任我軍，并和紅軍对立。不宜选作战场。龙崗有优良陣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向我軍方打来，我方陣地也好。

——龙崗方向，紅軍能集中最大兵力。

——龙崗西南数十里兴国，还有一个一千余人的独立师，可以迂回敌后。

——紅軍若实行中間突破，将敌軍的陣綫打开一个缺口后，敌之东西諸縱队，便被分离为相距很远的两群。

（三）战役經過：

紅軍开始拟先打譚道源师，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陣地，紅軍曾两次开进，却都忍耐撤回，过了几天，终于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部。

1930年12月27日战役开始，第一仗打着了張輝瓚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紅軍在拂晓集中全力向敌进行奇襲，因而全部歼灭。一战胜利，吓得譚师向东韶跑，許师向头陂逃跑，紅軍又追击譚师消灭該师一半，1931年1月1日結束，5天内紅軍打两仗，消灭敌一个整师又半个师，蔣軍前敌总指揮長張輝瓚被俘，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諸敌畏死紛紛撤退，中央区紅軍和人民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就这样仅以两个歼灭性的突击，便把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粉碎了。

（四）战役特点及主要經驗：

在总兵力上，我們4万对敌10万。由于初战慎重待机，终于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完成了歼灭战。

在战法上，敌分进合击，我則撒开两手，誘敌深入，造成了各种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然后确有把握的集中兵力，实行中間突破，打击敌人要害。

在時間和战果上，時間短胜利大，五天内打了两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半师，結束了第一次反“圍剿”战役。

第二次反“圍剿”的胜利（图三）

第一次“圍剿”被粉碎以后，蔣介石經過了四个月的准备工作，在1931年5月，又开始了第二次“圍剿”。

（一）敌軍的情况：

——“圍剿”的軍隊共20万人，何应欽为总司令，駐在南昌。此次敌軍采取“隱扎隱

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分四路挺进（另外还有一路为刘和鼎师在建宁）其进攻态势有如一条长链，从赣江向东延伸到福建的建宁。

——敌军的战斗力，从蔡廷锴的19路军、孙连仲的26路军、朱绍良的8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敌军全部仍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第43师）和郝梦麟（第54师）两师大体相同。

——蒋介石进行了四个月的准备工作。

（二）红军的情况：

——红军三万余人，较上次战役略减，但有了四个月的休整准备——在反“围剿”开始之前，红军的领导机关召开了作战会议，分析了敌情，研究了作战方针等问题。红军部队在古龙冈（兴国东）一带地区消灭苏区内的白点，以创造战场。进行了敌我形势的分析和争取胜利的困难与有利条件的长期政治教育。战役开始之前，并召开了誓师大会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

——肃清了AB团，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

——红军若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敌之“围剿”。红军若从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红军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基于以上理由，红军的作战方针，则是先打弱敌，迫敌而居，待敌脱离其阵地运动中各个歼灭。因此决心先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部（共11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向东横扫各个歼灭。

（三）战役经过：

红军开进到东固，迫敌而居，宁可冒走漏消息的危险，等敌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等了25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1931年5月16日战役开始，王部由富田向东固前进时，进至中洞（富田南），红军出敌不意，猛力袭击王部的28师（公秉藩）敌军大乱，遂向富田溃退，在追击中大部被歼；接着红军向东横扫，在白沙、沙溪打郭华宗的43师，在滕田歼敌孙连仲部1个旅（属高树勋之第27师）；在广昌歼敌许克祥24师一个团；在建宁歼敌刘和鼎师一个团。5月30日胜利结束。15天中，红军走路700里，打垮了敌的三路军（第5、8、26路军）并外加一个刘和鼎师。打了五个胜仗。毙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四）战役特点及主要经验：

在总兵力上，我以3万对付20万，敌兵力超过我7倍，由于我进行了4个月的休整准备，确立了正确的战役计划，因而痛快淋漓的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在战法上，敌四路挺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则先打弱敌，迫敌而居，乘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之。

在时间和战果上，15天，走700里，打了5仗，总计歼敌3个师以上兵力，缴枪3万余支。时间少，打仗多，胜利大，创造了红军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典型。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图四）

1931年7月，蒋介石又发起第三次“围剿”。

(一) 敵軍的情況：

——蔣介石親自出馬任總司令，隨帶英、日、德等國的軍事顧問，分三路進攻中央區，中路何應欽，與蔣同駐南昌，右路陳銘樞駐吉安；左路朱紹良駐南豐。

——蔣軍30萬人，主力軍是蔣的嫡系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5個師，每師9個團共約10萬人。其次是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3個師，4萬人。再次是孫連仲軍2萬人。其餘均非蔣的嫡系，較弱。

——蔣介石把這30萬大軍，區分為挺進縱隊（陳羅、趙衛、蔣蔡韓等三路挺進蘇區），綏靖軍（以將近半數兵力分區設防，維持其後方秩序）並以蔣鼎文師及一個攻城旅組成總預備隊。

——敵軍採取“長驅直入”的作戰方針。乘我軍未很好休息補充之際，先聲奪人，大軍壓境，佔領了蘇區全部縣城，企圖壓迫紅軍于贛江而消滅之。

(二) 紅軍的情況：

第二次反“圍剿”結束至第三次反“圍剿”開始，為時僅一個月。紅軍苦戰後沒有休整，也未補充，仍是3萬人左右，又從建寧繞道千里，回到贛南根據地西部的興國集中，此時敵人“已分路深入根據地，直迫紅軍面前。

——紅軍則利用蘇區疲困敵人，採取了“避敵主力，打敵虛弱”，乘退追殲的作戰方針。紅軍運用“磨盤戰術”盤旋打圈子，使敵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造成敵之弱點，然後消滅之。紅軍首先預定由興國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人後方聯絡綫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于無用之地，以此為作戰的第一階段。等敵回頭北來，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以此為第二階段。

(三) 戰役經過：

當紅軍向富田開進之際，到老營盤時，被敵發覺了紅軍迂回其側後的計劃，陳誠、羅卓英兩師立即趕至富田。紅軍遂改變計劃，實行中央突破，回到興國西北部的高興圩（此時只剩這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縱橫幾十里容許紅軍集結）。集中一天後，乃決心向蓮塘、良村、黃陂方向突擊。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師和蔣、蔡、韓軍間之40華里空隙地帶，轉到蓮塘。第二天即和敵上官雲相軍（上官雲相指揮的他自己的一个師和郝夢麟師）到哨接觸。第三天打上官雲相師為第一仗，殲其全部。第四天打郝夢麟師（54師）為第二仗，又再次殲滅該師。爾後紅軍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為第三仗，殲其兩個團。一周之內三戰三捷、繳槍過萬，敵軍傷亡被俘三萬餘人。此時所有向西向南的敵軍主力，都轉旗向東，集中力量向黃陂地區猛力并進，找紅軍作戰，採取了密集的大包圍態勢接近了紅軍。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在蔣、蔡、韓和陳、羅軍之間一個20華里間隙的大山（尖嶺壩）中巧妙地偷越過去，由東面回到西面的興國境內楓邊、白石、良村一綫隱蔽集結。當敵發覺在向西進時，紅軍已休息了半個月，敵則飢疲沮喪，無能為力，只好下決心退却了。紅軍又乘敵退却，猛力追擊，在方石嶺消滅韓德勤的52師，韓德勤本人被俘後化裝伙夫逃跑，在老營盤消滅了蔣鼎文的獨立旅，在高興圩與蔣光鼐、蔡廷鍇打成對峙，讓其逃走了。到9月間，蔣介石親自指揮的對中央區紅軍的第三次“圍剿”仍然被粉碎了。

(四) 戰役特點及主要經驗：

在總兵力上，我以3萬對敵30萬，由於高度發揮了運動戰、殲滅戰的特點，因而殲滅

了进攻的敌人。

在战法上敌长驱直入，大军压境。我则运用磨盘战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迫歼。

在时间和战果上，3个月时间五战五捷，总计歼敌四个师以上的兵力，从而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图五）

在粉碎敌人对中央红军第三次“围剿”的同时，鄂豫皖根据地，由徐向前同志所领导的红军第4军团，连续粉碎了三次敌人的进攻，在1931年11月，红军第4军团扩大为红军第四方面军（仍由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在红军不断胜利的影响下，1931年12月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在江西南都起义加入了红军，编成红军第5军团。在这个期间内，红军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而新的革命形势，也就逐渐接近成熟。

正当革命走向新高涨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兵侵略我国东北，以后又进攻上海和华北等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引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涨起来，但蒋介石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却坚持他的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加紧法西斯恐怖的政策。在日本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为此并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但蒋介石拒绝了这一建议，而积极准备、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

1932年1月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继续向鄂豫皖区的红军进攻，红四方面军给予敌人歼灭性打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在不断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错误的估计国民党军队都是“偏师”了（不是主力军的意思），忽视了继续进行反“围剿”的准备，结果后来在强敌进攻面前，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四川北部。蒋介石在进攻鄂豫皖之后，在1932年6月，即南下对中央区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

（一）敌我作战方针及战役经过：

蒋介石以90个师50万兵力对中央区红军进行围剿，以顾祝同为“剿共”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向南丰、广昌进攻。

敌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

红军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的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坚决围歼战的作战方针。

这次“围剿”由1932年6月16日全面进攻开始，至1933年2月结束，前后达8个月。敌军由北向南齐头并进，向苏区进攻。红军一部阻止南城出犯的敌人，主力突击沿金（谿）抚（州）公路行进的敌人，浒湾铺一仗歼敌一个师，敌窜回抚州，重新部署。红军向南围攻南丰。此时敌分三路向南丰、广昌前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之面前。红军攻南丰未成，立即由南丰撤至宜黄、乐安以南隐蔽集结。随后以大兵团伏击的打法，在黄陂、大龙坪、登仙桥地区，经一天半的激战，将敌西路李明的52师和陈时骥的59师全部歼灭，李明重伤毙命，陈被俘。敌即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企图报复，罗卓英亲率第11、9师来增援。红军又在东陂、草台岗附近展开了大围歼战，红军集中主力围歼该敌，并以一部插至敌后切断敌之退路，结果在红军集中力量攻击下，又将萧乾的第11师全部歼灭，萧负重伤而死，并消灭9师的1个营。这两次战役结束后，“围剿”就基本上打

破了。

(二) 战役特点及主要經驗

在总兵力上，我以4万对敌50万。

在战法上，敌分进合击，我则声东击西，以大兵团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坚决围歼战。

在时间和战果上，一次比一次长，达八个月（主要战役只有三星期）歼敌四个师以上的兵力。

几个战略战术问题的研究

根据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历史事实，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红军的战略战术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第一，它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之上的。军队打仗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军队与人民紧密团结一致，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是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红军不可战胜的主要因素。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为什么要分兵呢？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为了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为了更能扩大工农红军和地方武装。只有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群众，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才能使红军及其战略战术置于一个可靠的基础之上，才能更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什么要集中兵力呢？集中兵力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这是在一定条件下化劣为优的作战方法。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1929年红军数次东进，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为以后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如第一次反“围剿”中，引诱敌人深入到根据地内，依靠群众和地形条件，取得了消灭敌人一个半师的重大胜利。第二次反“围剿”中，追敌而居达25天之久；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主力在宜黄、乐安以南隐蔽集结，进行大兵团的伏击战，这两次战役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如没有良好的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条件，这几次“围剿”的胜利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与发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乃是红军战略战术的基础。第二，它是按情况发展，从实际出发的。毛主席教导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毛选180页）这就是说，我们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必须以一种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才不致于碰钉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是很明显的，这就客观地规定了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的战争形式；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分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各项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灵活地掌握和执行了上述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取得重大的胜利。而“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所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则因脱离当时战争的客观实际，违背了上述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就不得

不走向失敗，而以長征宣告第五次反“圍剿”的終結。

從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戰役中，在紅軍的戰略、戰術上提出如下幾個問題來研究。

（一）集中兵力問題：

集中兵力，是第一、二、三、四反“圍剿”戰役中表現極為突出。這是紅軍所以能以少勝多，取得反“圍剿”勝利的中心關鍵。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紅軍始終居於數量上的劣勢。在這種情況下，就決定了紅軍必須採取內綫的持久防禦的方針。處於戰略內綫的防禦軍隊，往往容易陷於被動。要脫離這種被動的地位，從敵人里把主動權奪取過來，就必須在戰役、戰鬥上多打勝仗，更多的消滅敵人，以求逐漸改變攻守、進退、內綫和外綫的形勢。所有這些，基本上要依靠集中兵力的一着。

怎樣集中兵力呢？就是“在有強大敵軍存在的條件下，無論自己有多少軍隊，在一個時間內，主要的使用方向只應有一個，不應有兩個。”（毛選225頁）如同打拳一樣，只能用一個拳頭打人，不要用兩個拳頭打人。用一個拳頭打人，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那個拳頭上，這樣拳打出去才猛、狠，才有勁。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中紅軍的主力（第1、3軍團），始終在一個方向上行動，決不分散使用。這樣，紅軍在總的兵力上雖然居於劣勢（第一次，1：2.5；第二次，1：7；第三次，1：10；第四次，1：12.5），但在每一戰鬥上，紅軍總是占居優勢。正因為這樣，紅軍在每一個戰鬥上，都能速戰速決，全歼敵人。

集中兵力的好處，是容易理解的，但怎樣才能做到兵力的真正集中呢？按毛主席的講法，就是戰爭的指導者要有戰略頭腦，不為複雜的環境所迷惑，不為環境支配而失掉自主能力，不採取應付主義。以第一次“圍剿”戰役為例。在戰役開始以前，紅軍的活動區域，達南城、崇仁以南及吉安、吉水以東地區。當敵軍進攻開始以後，馬上將分散的紅軍主力從邊區（吉安、崇仁、宜黃、南豐之綫）向根據地的中心轉移集結（戰略退却），以引誘敵人深入到根據地內，群眾、地形等條件均有利於我之地區與之作戰。這種轉移行動，在軍事上叫做求心退却。將分散在圓弧上的軍隊，主動撤退到圓的中心點（地區）上來，兵力自然就形成了集中。採取這一果斷正確的行動，在實際上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首先，戰爭的指導者，必須具有戰略上的遠見，敢於承認戰爭的流動性和領土的流動性，不怕根據地部分領土的丟失；正確認識到領土的暫時丟失，正是為了不丟失。“如果我們丟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毛選211頁）其次，必須對軍隊內部和群眾中間，做一系列的組織工作，如“堅壁清野，堅壁清城”以及廣大的動員和說服教育工作。只有黨領導的軍隊，軍隊和人民緊密團結一致的人民戰爭，才有採取這一英明而有遠見的行動。

所謂兵力集中，是不是一切都要集中呢？不是的，首先，我們的兵力集中，並不包括放棄人民的游擊戰爭在內。當時立三路線主張放棄小的游擊戰爭，“一支槍也集中到紅軍中去”，那是錯誤的。只有主力紅軍，而沒有人民的武裝，那就是一條腿走路，那是要失敗的。其次，根據具體情況，以紅軍的支隊置於次要的作戰方向上。也是必要的。“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於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於強敵，或關係重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臨之，例如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

仗，集中4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1931年5月29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向建宁打7000人的刘和新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毛选227页）。

此外，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例如，某一区域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了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箝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突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这样也是必要的，而且是可以胜利的，但在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

总而言之，集中兵力的原则，是我军制胜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在具体运用中，又是灵活的。

（二）运动战问题

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这是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决定的红军作战的特点之一。因为在敌大我小，敌优我劣（指技术装备）的条件下，如果红军采取正规战、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必然要陷入被动的不利地位，即使在阵地战中胜利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也只能是给敌人以消耗，而不能达到歼灭的目的。如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的作战目标找到了新从北方调来的第5路军王金钰部，他们初来南方，对红军表示恐慌，同时生活环境的改变，在士气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以王金钰部作为第一仗的歼灭对象，这是完全适当的。但敌依托富田巩固阵地，在他们未出来之前，我们是不好去打的。第一、以红军当时装备的低劣，弹药补充的困难，要想对这样的敌实行阵地进攻，那就是以我之所短，击人之长，是很难实现全部歼灭的目的。第二、阵地进攻不能实现速决战的要求。当战斗发起后，红军不能在短期间内解决战斗，我的行动就暴露于敌，敌军各路就可能对红军主力实施战役上的包围，其后果是很难设想的。因此，红军是决不能，也不应当贸然向富田之敌举行阵地进攻的，最好的办法是等敌人出来的时候，在运动中来歼灭它。为此，红军当时迫敌而居，忍耐待机达25天之久，最后达到了目的。当敌人由富田向东固前进时，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了敌28师公秉藩部。接着红军在敌人还来不及变更其部署的时候，由西向东横扫过去，又接连打了四个胜仗，顺利地粉碎了敌人“围剿”。最突出的是第三次反“围剿”。这次反“围剿”不但敌人的兵力更大，而且大半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当红军主力第一天乘夜通过敌人部署的空隙地带，接连打垮敌人上官云相、郝梦麟、毛炳文的部队后，敌人在南方面的主力部队，都跟随红军东来，集中力量向黄陂方向猛力并进，一心想找红军主力决战。但红军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却扭头向西，由敌人布署之间一个20华里间隙的大山（尖岭塔）中巧妙地偷越过去，回到兴国附近集结休整。当敌人发觉再向西时，红军对那些调来调去，饥疲沮丧的敌人，又在运动中予以痛歼。红军不仅仅等待机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且调动敌人，创造机会，以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真是使军事领导者的指挥艺术发挥到最高的高度，成为运动的光辉典范。至于其他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也都是运动战中取得的。

由此可知，运动战是在取得人民拥护的条件下，以劣势兵力对付了强大敌人的有效作战方式，它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充分发挥军事领导者的主观指挥能力，它是红军最光荣的优良传统。以后在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中，运动战的思想又得到进一步的发

揮，如平型关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二、三、四、五次战役，就是以运动战来取得胜利的。

在未来保卫祖国战争中，由于我军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队还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我国又是一个大国，特别是我军有运动战的光荣传统，所以运动战仍然是我军作战的主要形式。但随着我国我军的具体条件的发展变化，将来的运动战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不会完全一样。其主要不同点之一，就是将来的运动战必须与阵地战相结合。但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则是不变的。

（三）速决战问题

红军作战的原则，在战略上是持久战，在战役、战斗上是速决战。战略上的持久战，是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而战役、战斗的速决，是作战指导上的客观要求，也是军事指挥人员主观指导能力的最高表现。因为当时红军只有一支部队，而敌人有若干支部队，如果红军在战役、战斗上不能速决，其余的敌人就都来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敌军一旦发现红军主力所在的方向以后，各个方向的敌军都马上围剿来了，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作充分的说明。

速决战的利益，是很明显的。不但我军知道，我们的敌人也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就一向叫嚷速战速决。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也几次叫嚷要打到鸭绿江边去过圣诞节。但这些都是战争（战略）上的速决，他们当然无法实现的。

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不但过去战争中应该如此要求，即在将来战争中也必须如此要求。我们在突破敌人防御时，如果不能迅速摧毁敌人的抵抗力量，迫使其放下武器，以至将顽强抗拒的敌人加以全部消灭，那么他们的援队就可能很快地上来，对我进攻的军队实施反冲击（反突击），特别是现代军事技术发达的条件下，迅速解决战斗不但是提供了更有利的物质条件，而且也更重要了。

要实施速决战，应当有许多具体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战，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毛选235页）

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两点，前面已经谈到，这里不必再讲到。

作战的准备，主要是发现敌人的弱点，如果敌人没有弱点时（这是实战中很少见的），就要制造弱点。如第二、三、次反“围剿”，敌人的战役布势，大体上是由东向西拉开一綫，红军两次都是由西向东横扫过去，这样红军就充分利用了敌人战役布势上的弱点。因为红军由一翼横扫的时候，敌人在其他方向上向第一綫部队，在我们看来就成縱深的部队，在当前的某一定的战斗中并不发生作用，这就是说，敌人是被我们各个击破的。又如第四次反“围剿”时，敌人的主力在东路南丰、广昌之綫。其在西的陈李两师，就成为孤立的军队，同时他们还相互間有一定的間隔。因此，红军首先从这两个师开刀，就完全击中了敌人的弱点。敌人的弱点，往往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之内才存在的。如果陈李两师向东继续前进，与东路敌军靠近之后，这个弱点就不显得突出了。当陈李两师被歼之后，红军就又调动了东路敌军来援，从而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第11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利的阵地，也是顺利实施速决战的重要条件。阵地的准备有时是我就敌，但通常都是

要求敌就我（誘敌深入）。我就敌较为困难。如第一次反“圍剿”，紅軍原計劃打源头的譚道源师，但敌人不脱离源头居高临下的陣地，因此紅軍不得不两次开进后又忍耐撤回。引敌就我，比較好办。如第二次反“圍剿”，紅軍在东固附近歼灭公秉藩师，就是这样的。

此外，有积极援助紅軍的人民条件，不但可以給予紅軍行动上的便利，还能給予敌人行动上許多不便的条件，使敌人耳目閉塞，疲劳沮丧，也是达到迅速歼灭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一、二、三、四反“圍剿”，各次战斗，都是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来打，其理由正是这样。

（四）歼灭战問題

歼灭战思想，是紅軍作战的根本思想。“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給予敌人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毛选237頁）

歼灭战，对于粉碎敌人的“圍剿”，具有絕對的意义。第一次反“圍剿”，紅軍第一仗歼灭张輝瓚主力两个旅一个师部；第二仗，追灭譚道源的一半，就这样把敌人的“圍剿”打破了。第二次反“圍剿”，在15天之中，歼灭敌人两个师，一个旅，两个团，从而再“圍剿”打破了。第三次反圍剿”，歼灭敌人三个师，一个旅，二个团，就把“圍剿”打破了。第四次反“圍剿”，紅軍歼灭敌人三个师，一个营，就把“圍剿”打破了。敌人“圍剿”的部队，如同一条鏈条一样，紅軍只要歼灭其几个作战单位，这个鏈条就断了，沒有一定的后续部队和调整时间，这个鏈条是接合不起来的。毛主席經常教导說：“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潰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毛选237）其意义即在于此。

要进行歼灭战，首先就要集中兵力。集中兵力和歼灭战是一物两面，沒有前者，也沒有后者。此外，“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敌、出敌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毛选237頁）

歼灭战思想也是今后我軍作战的根本思想。毛主席十大軍事原則中，就一再指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絕對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圍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又規定“咬指头”的战术，因此，我們必須很好地研究和貫徹歼灭战的思想。

第三、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图六）

第五次反“圍剿”前的一般情况

1930年6月至10月間，党中央以李立三同志为首，曾經要求組織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紅軍向中心城市的总进攻。这个錯誤計劃曾經引起国民党統治区党的秘密組織的严重損失，但是在紅軍中却因受到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坚决抵抗，沒有发生大的影响。1930年10月李立三同志的錯誤受到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糾正。但在1931年1月，以王明、博古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傾派別，又利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外衣，起来攻击三中全会沒有糾正所謂李立三同志的“右傾”，并經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的領導地位，組織了临时中央。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新的“左”傾派別，完全否認由日

本侵略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的重大变化，認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間派別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他們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都是一致的，要求党向他們一律进行“决死斗争”。在紅軍战争的問題上，他們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繼續要求夺取中心城市；国民党区域、城市工作問題上，他們反对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关于利用合法、积蓄力量的思想，繼續实进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錯誤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組織差不多全部受到了破坏，由“左”傾分子所組織的临时中央也在1933年搬入了中央紅軍根据地。临时中央到达紅軍根据地后，虽然已与在紅軍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員如毛泽东同志等相汇合，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对于紅軍的领导。

在第四次反“圍剿”之后，紅軍第三、五軍团先后进入福建中部，打沙县，占洋口，圍延平，进逼水口，消灭了反动地方武装卢兴邦部，打垮了十八路軍区寿年部。在此期间，中央苏区曾經在5月分展开了猛烈的扩軍运动，紅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立了第七軍团（以贛东北的第十一师和中央苏区一部紅軍組成，肖勁光同志任司令員），轄第十九、二十师；主力紅軍得到了充实，将过去小师小团整編成大师大团。这时第一軍团轄第一、二、三师，第三軍团轄第四、五、六师，第五軍团轄第十三、四师，另有少共国际师（即后来的第十五师）及閩西第十二軍的第三十四师，正規紅軍4—5万人，地方武装約5万人。根据地橫跨浙贛閩粵四省，人口約300万。

国民党蔣介石軍队在四次“圍剿”紅軍失敗之后，得到了深刻教訓。他們开始懂得用“長驅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同紅軍作战是无法取胜的。因此，他們在第五次“圍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战术，企图消耗紅軍的生动力量与物質資材，緊縮革命根据地，最后則找寻紅軍主力决战，以达到其消灭紅軍之目的。

战役经过

1933年10月，蔣介石集中了100万軍队，对紅軍进行第五次“圍剿”。其中以50万人直接向中央苏区进攻，并分为三路：北路顧祝同，西路何健，南路陈济棠。敌人的計划是：首先进占黎川，尔后再繼續南进，以隔断中央区与閩浙贛苏区的联系。

此时，紅軍第三、五軍团即由福建回师。第三軍团于洵口（黎川东北）不予期遭迂战中，消灭了敌赵觀濤第六师的第十八旅，生俘旅長葛鐘山；第五軍团（第十三师）側击周渾元第三十六师的增援部队，因兵力未集中，仅給敌以杀伤，敌人縮回黎川。

照說洵口战役后，紅軍應該休息整頓，观察情况，創造条件，待机而动采取內綫作战方式，以各个击破敌人。毛主席指出了紅軍面前有几种不好作战的情形：第一，是当面敌人多了不好作战；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作战；第三，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陣地之敌都不好作战；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繼續作战，以上这些情形，紅軍都是准备走的。但当时在单纯防御的軍事路綫指导之下，紅軍却急于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既不把这一战看作全战役的有机序幕，也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并根据变化去誘导战争向胜利方向发展，反而到外綫去进攻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陣地并是白区的硝石。一战不胜，又令第五軍团（第十三师）去打敌人的巩固陣地并是白区的資溪桥（黎川东北），又不胜。尔后据轉寻战中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間，使紅軍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1933年12月中旬，敌周渾元縱队（三个师）向团村（黎川南）进攻，另以五个师担任掩

护。紅軍則以第三軍团的第四、五师担任主要突击，以第五团第十三师（只有一个团协助突击）任掩护。我先由东南方向突击，敌向西北溃退，因西南方向的紅軍第三师未能堵住，让敌逃走。这是由于用两个拳头打人，第一、三軍团分散，兵力未集中，所以未能全歼敌人。敌人经过整顿后，继续向南推进，紧缩苏区，紅軍則退守德胜关、大杉岭（团村东南，閩贛边界）地区，以掩护建（宁）泰（宁）苏区。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反蔣联共的人民政府）发生后，敌軍对中央苏区暂时采取守势，而抽調一部兵力沿光泽、邵武、順昌、直下福建去进攻第十九路軍。照說此时正是我軍消灭敌人的良好机会，但在教条主义者的指导下，紅軍第三、五軍团沒有出击，反而繼續采取守势。虽然第一軍团此时出烏口（吉水东南）、神崗、党口（宜黄东南），打了些胜仗，但对全局并不起大的作用。

福建事变失败后，敌人即集中全力繼續进攻紅軍，并以蔣鼎文任东路“剿共”总司令，于是合圍之势遂成。敌軍作战计划，首先就是打通泰宁、黎川之綫。我軍曾与敌在康都（建宁西北）、建宁、泰宁地区周旋数日，节节抗击，終未取胜，被迫后撤。其后，敌罗卓英率领十一个师分四个縱队，由甘竹（广昌北）沿汝水两岸寬达十华里的正面上，一面修堡垒，一面逐渐向广昌推进。当时敌人采取以守为攻，夾河南进的战法。我突击河左岸，敌即集中力量于右岸前进，并于左岸留一部停止筑碉；我突击河右岸，敌又改由左岸前进，由甘竹到广昌40华里，敌人打了10天每日平均仅前进4华里，这简直是滚进了。此时，紅軍第1、3、5軍团均集中协同作战。但在紅軍装备低劣的条件下，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陣地战，虽也能給敌以杀伤，却束縛了紅軍高度的机动性，无法施展其固有的长处，既遭受很大的消耗，又擋不住敌人，真是費力不討好。这是典型的拼命主义。

广昌战役后，敌周泽元縱队由泰和向兴国突进。薛岳縱队沿滕田、沙溪向古龙崗前进，另3个縱队则分向宁都、石城前进。我第1軍团則到閩西一带与敌作战；第3軍团主力退至广昌、石城間正面設防，第5軍团在广昌、宁都間設防，第8軍团在古龙崗以北地区，另以第3軍团的第6师及江西地方武装在西綫兴国地区抗击周縱队，这样“分兵把口”，修筑工事，設鹿砦、埋地雷，企图阻敌前进。敌正面湯恩伯、樊松甫两縱队繼續推进。在这期間，紅軍曾組織了高虎壩、万年亭（均在广昌南部）战斗，完全采取近距離开火，“短促突击”，节节抗击的陣地战。敌軍欺我火力不强，采取营方队冲击。紅軍虽然曾給湯恩伯縱队以重大杀伤（3——4千人，平均14顆子彈杀伤一个敌人），但我亦伤亡很大，元气受損。高虎壩、万年亭战斗，是第五次反“圍剿”中陣地战发展的最高峰。此后，紅軍撤到驛前（石城北），第3軍团第4师防守右翼的凤凰山，第5軍团第13师防守左边刘桂峰（通宁都路上），第5师位于第4、第13师中間地区，沿广昌通石城大道設防。

敌人的进攻，以前每次均先用飞机轟炸，接着砲击，如此7、8小时后再以步兵在机枪掩护下实施冲击。此次敌人改变了战法，于零时前将队伍运动到我陣地前300——400公尺附近，天剛拂晓，即以飞机轟炸、砲火轟击，步兵随即冲击。敌先从第5师陣地（5华里正面上）及第4师宝峰山地区突破，拋棄两侧高地不管，只沿大道，鉅隙进攻，同时以一部兵力及部分飞机和砲兵分队向第4、13两师陣地側击，以掩护其主力前进。紅軍当时筑有三道陣地，各师設有第二梯队，但因敌人战法变了，未用上，而整个部署又无战役总预备队，結果被敌一举突破了三道陣地，前进10华里，这是敌人堡垒推进最迅速的一次。驛前战斗

后，第3軍团退守石城北的小松，苏区日益縮小。

第3軍团第6师在兴国、高兴圩、老营盘之抗綫击敌周泽元縱队，深感兵力不足，驛前战斗后，第5軍团全部赶去西綫增援，以后第1軍团也来了，結果突击高兴圩南北的敌人沒有成功，第1軍团即撤出战斗，第5軍团又与敌周旋半月，亦相繼撤至兴国以南待机。

紅軍由于党中央实行了完全錯誤的單純防御的軍事路綫和其他錯誤的政策，第五次反“圍剿”进行达一年之久，终于未能粉碎敌人的圍攻。1934年10月紅軍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史上前所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長征。

在“左”傾教条主义的錯誤統治下，長征的准备非常仓卒，目标也不十分明确，因此，他們在長征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錯誤，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會議，“左”傾教条主义一系列的重大錯誤，才得到糾正，从而在万分危难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国革命。

失敗的主要原因

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左”傾教条主义者在軍事上的錯誤，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一) 战略上的單純防御和陣地战思想

第五次反“圍剿”和以前各次反“圍剿”一样，是在敌大我小和处于內綫作战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敌人則采取較前更为穩重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和物质器材，紧縮革命根据地，最后則寻求紅軍主力决战，以达到其消灭紅軍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紅軍的战略路綫，只能是决战防御。就是說紅軍的防御不应当是單純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轉入反攻的防御。在战役、战斗的作战指导上，应当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求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圍剿”。但教条主义者却以單純防御（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陣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謂“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則来支持这种錯誤的單純防御的战略路綫。这样就不能發揮紅軍善于运动战的長处，而使敌人达到了它在过去几次“圍剿”中所不能达到的目的，紅軍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

單純防御固然可以相对地削弱敌人力量，并在一定时期保持土地，但要想粉碎敌人的“圍剿”以保卫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沒有的。只有从防御轉入反攻（战役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紅軍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根据地。

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情况下，紅軍仍然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事实上也多次証明了（如洵口、团村、將軍淀、建宁、湖坊、溫坊各战役，特别是第19路軍事变时）。我們还可以調动敌人，在运动中来歼灭它，即当敌人按照其計劃前进时，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的紅軍不应阻止它，待敌进至适当距离，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后，再包圍歼灭之（即誘敌深入）。为了胜利，暂时放棄一部分根据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了根据地，都是應該的。但是教条主义者由于“御敌于國門之外”就同敌人拼消耗，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却使紅軍由运动战轉变到陣地战，由积极防御轉变为节节抵抗的消极防御，否認了过去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的經驗，因此，第五次反“圍剿”就不能不以長征告結束。

(二) 作战指导上的平均主义思想

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红军处在战略的内线作战的情况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经常掌握主动权，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

但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主张“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把红军主力“主要是第1、3军团”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求胜，这样就使红军的兵力处处薄弱，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便利了敌人对红军的各个击破。第五次反“围剿”中，如洵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战役等，都由于红军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大的胜利。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给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种军事平均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极点。

（三）错误地认为战略上的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胜利

“左”倾教条主义者，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错误地认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即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大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红军的变化，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是完全破产了。

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地领导战役并正确地运用战术，才能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但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胜利，主要不是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仅仅依靠于战术，结果是不能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

（四）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的认识不正确

中国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因此，红军作战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在有利条件下，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和进攻，以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如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及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前）；而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红军作战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反“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争取速决。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针是不正确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对付红军的时候，红军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计划，在红军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为要进行战略的持久战，同时对敌人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都要进行速决战起见，所以红军要特别谨慎的决定其战略战役计划。第五次“围剿”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指导之下，红军进行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毛丁山、三溪坊、平疗、广昌等战役）。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玩弄暴动是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卒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在尽可能支持的时间内作必要的一切准备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歼灭敌人的部队，只有歼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五）没有利用第19路军事变来粉碎敌人的“围剿”。